

四川省认真从特大洪灾中吸取教训

种树种草努力扩大森林植被

谭启龙提出把林业搞上去的五项措施

新华社成都9月9日电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刚结束的全省林业会议上说，四川要认真从洪灾中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把林业建设搞上去。

谭启龙在讲话中提出，今年四川的特大洪灾，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但是，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条沉痛教训。在这次洪灾中，我们发现，凡是树种种得好的地方，有树有草的地方，下同样数量的暴雨，就平安无事；而没有树的就成灾，房屋冲垮，农田淹掉，损失很大。我们要从这次洪灾中吸取教训，切实把植树造林、

种草、水土保持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抓紧抓好。

谭启龙说，要把四川林业搞上去，必须解决森林过伐问题，坚决制止乱砍滥伐。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要调整采伐计划，在省的范围

内，能够减少任务的，要坚决减少采伐任务。

第二是加快造林、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该还林的要逐步退耕还林，该种草的要坚决种草。第三是确定山林产权、划留山以后，要普遍发证，划定范围，谁造谁有，长期不变。第四要以法治林，对破坏森林、违法犯罪的，要给予处理和法纪制裁。第五要加强森林防火防火工

作，建立责任制，保护好林子。

谭启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以对人民负责，对于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重新认识抓好林业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它作为一件大事，一年抓几次。要把发展林业作为农业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订出长远计划和分年实施

计划，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各级领导要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多出的劳力安排好，除了搞其它多种经营外，重要的是要用到造林上面来，种树、种草，努力扩大森林植被。从现在起，各级领导要认真地抓它三年、五年、十年，下番功夫，情况就会起变化。

全国劳改工作会议提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把罪犯改造成守法的劳动者

习仲勋强调，劳改工作是党的改造人、改造社会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由公安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结束。会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劳改工作要继续着眼于把罪犯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会议总结了劳改工作的经验，认为建国以来全国劳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劳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继续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改进监管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和文化技术教育，提高改造质量，调整和发展劳改生产，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会议认为，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押犯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罪犯中，反革命罪犯少了，绝大多数是普通刑事犯。这些罪犯大多是在十年内乱中长大

的。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他们绝大多数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既有很大的盲动性、破坏性、难管教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强、容易教育和挽救的一面。对他们既要严格管制，加强改造；又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纠正违反政策的现象，改革不符合社会文明的管理办法。对青少年罪犯，在他们服从管教的条件下，要象父母对待了传染病的孩

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关心他们的吃、穿、住、医疗、卫生，并且认真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促进思想转化。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劳改工作是党的改造人、改造社会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党中央很重视，社会上很关心。他说，广大劳改工作干部，为党的劳改事业进

行了艰苦的努力，立下了功劳。他们是无名英雄，应该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尊重。习仲勋要求劳改工作部门克服软弱涣散状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做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取得新经验。

会议是8月18日开始举行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吕剑光在会上讲了话。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领导同志和劳改工作单位的干部，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一项重点工作

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劳改改造罪犯的工作是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罪犯改造成新人、好人、有用的人，就会促进社会安定。

三十年来，劳改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称赞，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年内乱期间，劳改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广大劳改工作干部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劳改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拨乱反正，大力整顿，逐步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劳改工作干部工作和生活在比较艰苦的环境里，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他们是无名英雄，应当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尊重。

违法犯罪现象，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消除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前劳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继续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改进监管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和文化技术教育，提高改造质量，调整和发展劳改生产，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目前，改造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改对象大多是刑事犯罪分子，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十年内乱中长大的，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他们既有很大的盲动性、破坏性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强、比较容易教育挽救的一面。针对这些情况，劳改机关对被改造的罪犯必须严格加以管理，通过组织他们劳动加强改造。对绝大部分服从管理的青少年犯，要象父母对待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教师对待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逐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改造条件，促进思想改造。同时，对于在监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分子，要坚决打击。

劳改工作的好坏，改造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治安。政法工作只抓惩罚、破案，不抓劳改是不行的。劳改工作做好了，整顿社会治安的成绩就能巩固，反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劳改部门的全体干警，要认清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克服困难，下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各级党委和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劳改工作的领导，把劳改部门的领导班子调整、整顿好，逐步充实劳改工作干部队伍，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当前，要认真组织广大劳改工作干部继续学习好、贯彻好六中全会精神，克服涣散软弱状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争取社会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做出贡献。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说

我国人民的生活只能逐步改善

实践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方针政策是行之有效的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竹义胜为团长、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为副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一行26人。

会见时，邓小平同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邓小平对客人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定了一系列的方针。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下去。

他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人民的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如果我们不强调道德风尚，不

重视精神文明，没有远大理想，只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那就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

邓小平谈到了农业上实行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他指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不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他说，这种责任制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在交谈中，邓小平感谢日本公明党和竹义胜委员长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

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华等。

代表团是应邀于昨天晚上抵达北京的。

近日大雨仍不断 接连发生大塌方

宝成路和陇海路宝天段灾情扩大

在驻军和民工支援下，七千多名铁路工人冒雨抢修

万立方。有的路基冲毁，钢轨悬空，有的路基下沉4至5米。军师部车站附近一个山头，7日深夜开始滑动，严重威胁着车站和线路安全，铁路工人和当地农民已被迫暂时撤离这个地方。

截至目前为止，这两条铁路塌方断道已达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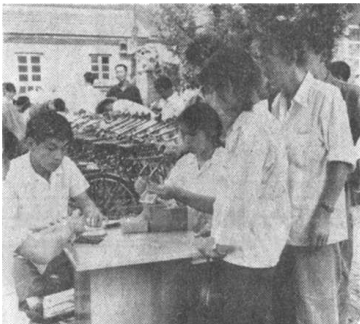
处，落石土约计160万立方。

灾情发生后，铁道部调集了西安铁路局、兰州铁路局、成都铁路局、铁路部大桥局和第一工程局7,000多名铁路工人，日夜冒雨抢修铁路。记者在宝天段抢修现场，见到1,000多名铁路工人正冒雨架设

一座跨孔60米长的拆装梁大桥。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轮班抢修，昼夜不停。雨大时，工人们穿雨衣、雨裤；雨小时，年轻小伙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工地上的干部和群众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在这里领导抢修工作的兰州铁路局副局长马福

禄也头戴安全帽、脚穿长筒胶鞋，同工人一起劳动。铁道部李克非副部长4次冒雨到现场慰问职工，指挥抢险。有的工人发烧到38度，有的拉肚子，都坚持不下火线。这座在正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大桥，工人们在雨中奋战了9天9夜就架好了。

奋战在宝成铁路沿线其他地段的铁路工人、解放军战士和当地民工，在抢修中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农民纷纷购买自行车

河北省吴桥县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纷纷要求购买自行车等中、高档商品。这是桑园镇的群众在购买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李昌元摄

赵紫阳会见阿里的宾主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诚挚交谈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海会见了埃及副总理兼外长卡迈勒·哈桑·阿里一行。

会见时，宾主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中埃双边关系进行了诚挚的交谈。

阿里转交了萨达特总统给赵紫阳总理的一封信。

赵紫阳对此表示感谢。他说，萨达特总统为发展中国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阿里说，埃及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赞扬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坚持原则的政策。他说，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合作，但从来不想控制这些国家的人民。

赵紫阳请阿里回国后转达叶剑英委员长和他人对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重申了叶剑英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对萨达特总统访华的邀请。

今天晚上，阿里副总理兼外长和夫人一行应邀观赏了舞剧《丝路花雨》。

新华社西安9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侯嘉荫报道：遭受洪水袭击中断运输的宝成铁路和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段，因近日大雨仍然不断，灾情继续扩大。铁道部调集的7,000多名铁路工人，在驻陕部队和当地民工的支持下，正冒雨大雨，日夜不停地紧急抢修。

9月2日至7日，在宝成铁路的军师部、观音山车站和宝天段的建河、葡萄园车站等地方，又接连发生大塌方，落石达40多

开展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繁荣文艺创作

周巍峙向人大常委会会议汇报文化艺术工作取得的成绩、检查当前文艺创作的缺点错误

周巍峙说，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拥护三中全会开创的伟大历史转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对待在转折时期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十年内乱造成的后遗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文艺工作中，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周巍峙说，文艺界中，有些人把解放思想、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有的甚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框框，是四根棍子。有的人不要党的领导，甚至有的人鼓吹创作要“长几块反骨”。有的人认为文学艺术就是文艺家的自我表现，反对文艺创作要考虑社会效果。这些情况，反映了文艺界有少数人要求“绝对自由”，争取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利”，要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应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对作者白桦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帮助的态度。

周巍峙批评有的作品歪曲生活，或追求离奇的情节，胡编乱造一些荒唐的故事；有的作品制作感官刺激；在艺术表演中存在着一些庸俗作风；对传统文艺节目的演出，不加选择，不注意内容的改革，糟粕与精华并存，等等。他指出，在内容和艺术上不健康的、格调不高的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散布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情绪的文艺作品或艺术表演，对人民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害的。已经引起广大群众、读者的不满。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最近举行座谈会，讨论文艺界如何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等问题。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们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和胡耀邦同志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正确的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从政治内容到艺术技巧作了具体的分析和严肃的批评。有些同志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座谈会是由文化部和文联联合召开的。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主持了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到会听了大家的发言。

文艺界在首都部分领导干部、作家、艺术家、评论家5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周扬、刘白羽、张光年、艾青、姚雪垠、陈荒煤、赵寻、阮章竞、陈荒煤、吴作人、魏巍、金山、林默涵、曹禺、林杉、魏传统、王蒙、苏一平、张水华、周巍峙在座谈会上发了言。还有一些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周扬在发言中说，思想战线和文艺界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中央及时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切实的工作来改变这种状态。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是很活跃、很有成绩的，中央已多次给了我们以鼓励和帮助。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要更多地看到不足，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看到成绩，纠正缺点，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应当批评，并帮助作者认识这个问题。就是有才能、有成绩的作者，也不应拒绝批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文艺界和思想界就将变成一潭死水。对《苦恋》没有及时进行正确批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他希望大家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文艺界真正开展起来，做到批评经常化、正常化、科学化和战斗性。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文艺界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加强对文艺的领导 改变涣散软弱状态

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提出对于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正确的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

刘白羽说，要改变党对文艺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切实抓好文艺批评。他说，文艺批评能够推动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张，包括那些企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作品，也会应运而生，这是不足为奇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文艺批评，首先要注意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方法不好，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他希望通过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统一全国、全军文艺工作者的认识，增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张光年说，文艺界经过十年大动乱，刚刚形成初步繁荣兴旺的局面，决不能损害它。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不会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文艺局面。但道理不足、气势压人的批评，会产生不良的效果。他说，我们不能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作家、艺术家通过艺术形象评价生活，赞扬美好的、新生的事物，鞭挞某些不好的、阻碍生活前进的事物，这也是一种批评，怎么能考虑以至吸取别人的正确批评呢？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都要遵循共同的政治方向，都要受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我们的文艺编辑工作，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我们正在联系实际学习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我们有不少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切记取的。对于某些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现象，不及时批评，将造成更大的损害。

姚雪垠在发言时指出，《苦恋》代表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他希望通过对《苦恋》的批评，把两种创作思想、两种创作方法、两条创作道路的问题弄清楚，使错误思想得到纠正，文艺创作、理论队伍得到锻炼，

广大读者受到教育。他说，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效果不仅是歌颂，也有批判，有揭露。但批判必须有正确的目的，从感情到立场都要推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我们不同意作家说假话，粉饰现实，但是我们更不能允许歪曲现实的方法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写得那么糟糕，更不能说把社会主义写得越糟糕就意义越深刻。

赵寻说，当我们批评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时，为什么这个作家和作品明明是有错误的，受到了批评反而有些人表示欢迎呢？因为这种错误是代表一种社会思潮。“文化大革命”对群众采取了高压政策，现在有些群众要求文化上的甚至无任何限制的自由民主，是这种高压政策的反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借着群众这种心理得以流行。当然，我们在反对自由化的同时，也要继续反对在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我们的批评才有力量，才能有的放矢，达到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目的。

陈荒煤认为，经历了十年动乱，有一些作家企图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寻求分析其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根源。这种想法不应该非难。但有一部分人产生了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而求助于资产阶级的人情、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竭力歌颂抽象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地位，甚至把知识分子受迫害自由化是客观规律。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一种完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林默涵认为，要克服文艺界领导涣散软弱状态，必须做到两个一致。第一，必须做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第二，文艺界本身的团结一致。同中央政治上的一致是文艺界团结一致的前提。没有同中央政治上的一致，文艺界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他在谈到当前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些问题时说，承认无产阶级

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认为文艺只是个人的事业，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认为我们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理的出发点。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家和群众结合、文艺的社会效果、文艺家的世界观、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提出和解决，都是为了使文艺成为推动革命的一种有力武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首要问题。

曹禺说，十年内乱，造成各种混乱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使有些人思想更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固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仍不可低估。但当前首要的是，必须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必须对违背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我说，我是70多岁的人，经历了几个朝代。事实使我看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得之不易”；“四人帮”把我们国家搞得民生凋敝，是现在的党中央把它挽救过来，我们现在的党中央也是“得之不易”。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四化的基础。破坏它、损害它，是决不允许的。党中央想得很深、很透，一方面提出坚决克服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要理直气壮进行批评；一方面又一再提醒我们，批评要实事求是，要与人友善。要讲究批评方法，要分寸适当。我认为，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的文艺界和条各条思想战线，必然会蓬勃发展，文艺作品以及各方面的事业，都会更加繁荣。

王蒙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全国呈现出一种如江河奔腾的大好局面。与此同时，必然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前的一些错误思想，其实是从“四人帮”时就开始的。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发扬民主，实行双百万方针的基石。他建议特别在青年作家中展开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他说，开展战斗的、民主的、经常的文艺批评，就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在某些中青年作者中存在着的“骄”“娇”二气、自由主义、形而上学、派性等思想障碍。

北京市纪委同意市纪委筹备组的处理意见

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扶持正气，批评邪气，对揭发检举不正之风的同志，一定要给予支持和保护，如有打击报复，要严肃处理。

在京台湾同胞举行茶话会欢迎黄植诚共叙骨肉同胞之情 畅谈统一祖国心愿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在北京的130多名台湾同胞今天下午举行茶话会，和原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欢聚一堂，共叙骨肉同胞之情。

茶话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参加茶话会的有在大陆工作几十年的台胞，也有新近从台湾和国外回来的台胞。

台盟主席蔡啸致欢迎词时，首先代表台盟总部、全国台联筹委会、台盟北京市支部和在大陆的全体台湾同胞，热烈祝贺黄植诚驾机起义荣归祖国大陆。他说，黄植诚生长在台湾，由于不满台湾同祖国大陆长期分裂的局面，毅然驾飞机回到祖国大陆，这是光荣的爱国正义行动。我国政

鲁迅和茅盾合编的《草鞋脚》出版

新华社长沙电 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鲁迅、茅盾合编的现代短篇小说《草鞋脚》。这是他们在1934年由美国友人之约编选的，目的是将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外国去，但当时这书未能问世。现在根据这书最初的原稿排印出版。茅盾生前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关于〈草鞋脚〉》。

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是真诚的、一贯的、坚定的，完全代表了海峡两岸广大同胞的心愿。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这是历史的潮流。台湾当局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有光明前途。

黄植诚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感谢了回到大陆后参观工厂、农村和名胜古迹的感想。他说，祖国大陆城乡一派繁荣景象，文化古迹保存完好，我感到祖国的发展潜力很大。他表示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林盛中、王万得和陈祖生等台湾同胞分别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黄植诚介绍了台湾

同胞在祖国大陆工作和生活情况，热情赞扬党和人民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怀。

全国台联筹备组负责人林丽福在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努力，为统一祖国和实现四化作出贡献。她还谈到，台湾南部受14号台风的影响暴雨成灾，对受灾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茶话会上，人们即兴赋诗唱歌。黄植诚在热烈的掌声中演唱了他自己根据台湾民歌的曲调填词改编的《北京故事多》。他唱道：“北京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北京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象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一包括……”

茶话会由台盟总部、全国台联筹委会和台盟北京市支部联合举办的。出席茶话会的还有李纯青、苏子衡、田富达、徐明山、陈逸松、董克和陈炳基等。



邓小平同志同埃及副总理握手。



赵紫阳会见阿里副总理一行。照片均新华社记者摄

黄华同阿里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同埃及副总理兼外长卡迈勒·哈桑·阿里举行了会谈。

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中东局势、阿富汗和柬埔寨等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埃及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国务秘书萨拉赫丁·沙拉维，埃及驻中国大使易卜拉欣。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

薄一波会见美国国朋友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一波今天会见了美国克里夫兰《实报报》发行人兼总编辑托马斯·维尔夫人。

薄一波回顾了维尔先生提出的有关我国经济和对

薄一波回顾了维尔先生提出的有关我国经济和对

薄一波回顾了维尔先生提出的有关我国经济和对

邓颖超宴请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晚设宴欢迎以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由泰国外交部副次长威近

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肖向前，泰国驻华大使肯颂·信他万霞参加了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同比利时法语区文化大臣米歇尔·昂塞纳和弗拉芒语区国务秘书亨利德盖夫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同比利时法语区文化大臣米歇尔·昂塞纳和弗拉芒语区国务秘书亨利德盖夫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同比利时法语区文化大臣米歇尔·昂塞纳和弗拉芒语区国务秘书亨利德盖夫

开展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繁荣文艺创作

的团结。我们要通过对错误倾向的批评和斗争，把文艺评论工作，积极地开展起来，使之走向经常化、健康化。

他说，过去，在文艺战线上搞了不恰当的、过火的批评斗争，后果不好。我们一定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一定不搞运动。要用开出的繁花和结出的硕果来解除那些善意的忧虑和担心。现在国内外、海内外，确有极少数人思想想找什么由头，造谣诬蔑，胡说什么中国的文艺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又变了，文艺上要“刮”了，“寒潮又来了”，又要走老路，搞运动了等等。他们妄图进行挑

中比两国政府文化合作计划在京签字

这个计划是根据双方在1980年12月9日签署的两国文化合作协定而制订的。这个计划具体规定了中比两国在教育、科学、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项目，其中包括文化代表团和艺

术、体育、科技代表人士互访，相互提供奖学金、互邀教授进行讲学、座谈等活动，继续鼓励两国高等院校、音乐团体、广播电视机构等直接建立联系。对外文委副主任周复，比利时驻中国大使罗泰·德诺睦，出席了签字仪式。

不断提高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

要密切联系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提倡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

（三）抓好文化事业的管理整顿

《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组织各种文化艺术门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群众文化生

（四）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组织各种文化艺术门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群众文化生

（二）抓好文艺队伍的建

设，不断提高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要密切联系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提倡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

浊漳河的变迁说明了什么？

山西省林业厅厅长 刘清泉

浊漳河两岸五十年代大力植树造林，河不冲，土不流，产量高。六十年代后，森林不断遭破坏，河水变浑，气候失调，沙荒扩大，农业生产下降。

五十年代，浊漳河曾是一个以生物措施治河的范例。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表扬山西省榆社县植树造林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报道。

可是后来，浊漳河的治理，却默默无闻了。浊漳河的情况究竟如何？不久前，我同几位同志到榆社县调查访问，所见所闻使我非常惋惜，也看到了希望。

绿了和顺山 清了漳河水

榆社县是由石质山和黄土丘陵地区混合组成的山区，浊漳河五条支流均匀地布及全县，这些主、支流两岸，是肥沃的“米粮川”。

古代的榆社，曾是“林木阴翳，百鸟群集”之地。抗日战争以前，浊漳河的发源处石源一带，还有近10万亩森林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4.3%。以后，由于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农民上山毁林开荒。据资料介绍，全县有1,700户农民到石源一带开荒种地，把浊漳河上游的水源林地开垦为农田。加之日本侵略军对森林的砍伐破坏，到1945年，只留下树木15万株，残林20,000亩。由于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山地水土流失，河川土地被冲毁，浊漳河两岸的米粮川，就被洪水冲毁了10万亩，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荒地，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群众痛心地说：“开了和顺山（石源曾属和顺县管辖），漂了榆社米粮川。”

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疾苦，倾听群众意见。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起，就教育群众停止毁林开荒，开展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以后又向全县人民发出“植树造林，管制河流”、“造林护林，富国利民”的号召。特别是1952年以后，在农村牧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植树造林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就越来越显著。经过持续几年的努力，到1957年，植树650万株，造林22万多亩，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2%。特别是浊漳河两岸营造的75,000亩大型防洪护岸林，象两条绿带，牢牢地捆住了浊漳河这条蛟龙，为榆社人民兴利除害。起伏的山峦到处松林密布，增加了植

按照生产合同供应生产资料

安徽省当涂县黄池公社今年开始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时，在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上，仍采取过去逐级计划分配的老办法。结果，层层克扣，社员意见很大，说：我们同生产队订的生产合同，项项都是向我们伸手“要”的，可是国家、集体应该“给”我们的，比如化肥、农药，一项也没有订出来。这样的合同太不公平了！公社党委感到社员的意见很对。6月中旬，他们把黄池供销社干部找来一道商量，决定改变老办法，试行按照生产合同分配和供应农业生产资料。

首先从比较紧缺的化肥供应开始，从7月份起实行。具体做法是：公社根据县里每次分配的化肥总数，按全公社包产田亩计算出每亩供应量，由供销社印制化肥票证，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凭各农户包干合同书到供销社领取化肥票证，最后按各户承包田亩发放。已经领了化肥票证农户的合同书上都盖上印戳。县里7月份给这个公社先后三次分配硫酸铵、尿素、复合肥料共309吨，供销社按照生产合同，给全公社3,710户社员发了化肥票。

黄池公社党委这样做很得人心，他们打算进一步扩大按合同供应生产资料的种类，并根据合同兑现情况来供应，尽量使那些全面执行合同的，对国家贡献更多的农户，得到的生产资料也多一些。

这种办法有四个好处：一是弥补了目前合同上存在的“只订农民卖与交，不订农民买与要”的缺陷，有利于完善生产合同制和生产责任制。二是合同双方都履行责任，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三是能够堵塞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上的后门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农商关系。四是农民及时买到生产资料有利于搞好农业生产。

鲁道生

当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单位，大都是用合同的形式，把承包社员对国家的交售、对集体的提留等固定下来。这种合同一般都是只订农民向国家、集体应承担的任务，而不管农民生产需要的供应。黄池公社改变了这种作法，把农民应交售的和农民生产所需要的，同时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农民很受欢迎。这样，有关国家不向农民要东西，而且也关心农民要什么。这是订合同方法的一种改进，也是有关改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一种做法，值得各地重视。

——编者

张有登盼到了骡马

想养骡马，是河北省康保县那家沟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张有登多年梦寐以求的事了。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牧，十分喜爱骡马。那时他做梦都在想：有朝一日，自己家也养上骡马该有多好啊！然而，年复一年，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解放后，虽然分到了土地，但

身单力薄，一下子还买不起骡马，很快就就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了，个人对于骡马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张有登养骡马的念头也渐渐淡忘了。后来，批“自发势力”，加上家里光景又不好，买骡马的事，他也不敢想了。

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逐步得

到落实，张有登一家的收入也多了起来。他想买骡马这桩心事又死灰复燃了。他买回一匹连牙都磨光的马和两头驴。对那匹老马，他倍加照料；每天把草铡得碎碎的，筛得净净的，一夜总要添三四次草，料还要煮熟。老马一天天强健起来，并且怀了驹。

今年5月份，老马下了一头枣红驹驹；7月份，两头驴也先后下了两头骡驹。一家一年有了三头骡驹，在这一带被传为新闻。当人们向他祝贺时，老汉总是抚摸着他的骡驹，高兴地说：“要不是三中全会政策好，俺那能有三头骡驹子，恐怕到临终也未实现不了养骡马的愿望啊！”

杨珍



张有登和他的骡子。

“怕事老头”讲了真心话

湖北省广济县石佛寺公社农科所社员，每当日论如何发展家庭副业时，都说年近六旬的老社员具体收入。有一些年轻小伙子，与他一块儿劳动时，总想挑逗他说出家庭副业的收入。可是燕老头一听听他这话，就设法避开，换个地方干活，唯恐说漏了嘴。所以，社员们都管他叫“怕事老头”。

“怕事老头”在六十年代就担任过生产队长。那时，社员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他白天带领社员干集体活儿，晚上和休息时又发动社员搞家庭副业，两年就用掉了“三靠”帽子，一跃成为有名的富队。老燕不但养了猪，还养了鸡、鸭、羊等，每年家庭副业收入就有一千多元。在十年动乱岁月，老燕被打成“暴发户”，挨批斗。从此，他家里一头猪，一只鸡鸭也没养，什么家庭副业也不搞了。

党的三中全会，象一股强劲东风，吹燃了他心头之火。他与老伴商量，买回了3头小猪，30只鸡，100多只鸭。他看到报上登的养蜂、养土鳖虫等技术，就认真学习，并购回蜜蜂和土鳖虫。他想：党的政策好，就怕以后变；不管变不变，发展家庭副业的收入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以防日后招麻烦。于是，家里猪儿散养，鸡蛋蛋出售，都由他一手包办，不让家里人沾边。地里不管谁，也打听不出他家庭副业的具体收入。

前些日子，他通过学习，深信党的好政策不会变了，于是憋不住心头的喜悦，在会上讲了他上半年每项家庭副业收入的情况。他一项项地数落着，一共两千三百多元。他说：“能有这么多的收入，全归党的政策好啊！”

程道炳

河水含沙量增多，城关、郝北等公社的几个大队，河床淤积比原来提高89厘米。毁林后，使部分土地阴湿荒芜。据常银、魏城等15个大队调查，原有4,000多亩林地的树木被砍伐后，土地下湿，不能种田，变成了沙荒。社员使用木材量也减少了，五十年代年均560立方米，七十年代减少到380立方米。

前些年不仅毁林木，还限制造林。1976年冬天，县林业局赵德安同志（是局里唯一的一个林业技术干部）下放到云云公社东庄大队。他和队干部一起既抓粮食生产，又抓植树造林。1977年春，全队栽了4万多株树，人均100株。这一年粮食增产了6万斤。但当时县里的个别领导同志，却认为这个大队不务正业，

为什么同样降暴雨，灾情大不同？

——从玉林地区看森林覆盖对抗灾能力的影响

玉林地区位于广西的东南部，又称桂东南地区。“玉”者，“郁”之谓也，古名“郁林”，那时候树木是很多的。全地区23,000余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和四川盆地相仿，也是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丘陵盆地之一。1980年底估算，有林地的森林覆盖率约为18.5%，另外还有8.9%的疏林，估计能起到防护作用的森林覆盖率仍有25%左右。这些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满足人民对林产品的需要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今年在抗御暴雨灾害中，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7月12至14日，当四川的成都、绵阳等地区83个县、市先后遭受暴雨灾害的时间里，玉林地区也受到连续两次特大暴雨的袭击，6月29日一次，7月22至25日一次、24小时降雨强度一般最少300至400毫米，陆川、北流、容县、博白、桂平等县有些公社500至600毫米。6月29日上午8时至30日

上午8时，陆川县测得的降雨量是610毫米，超过解放以来全广西所有气象站测定过的最大降雨纪录，为罕见的特大暴雨。最大的降雨纪录是容县满洲水库测定的860.5毫米（一次暴雨），为全地区年平均降雨量的51.15%。不容讳言，人民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巨大损失。总共受害面积11,600平方公里，75个公社，近1,000个生产大队，农业人口约345万；受淹粮田97万亩，秧田32,000亩，经济作物3,500亩；倒塌房屋40,576间，792户2,165人无家可归；死亡80人，受伤334人；冲毁塘坝796座，桥梁1,491座。合计损失约值人民币1亿余元。

然而损失程度与四川盆地相比较，那就轻得多了。

玉林地区的降雨强度要比四川

搞林业影响了粮食生产，1978年1月在全县群英大会上硬说这个大队粮食增产幅度小而进行批判。象这样的指导思想，怎能不打击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接受教训 重新起步

三中全会以后，榆社县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纠正单一经营的错误。领导认识到在林业的发展上走了一个大的弯路，决心八十年代重新起步。去年县委提出，榆社要致富，发展农牧业，并积极落实林业政策，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今年要育苗5,000亩，植树造林先布几个点，明年就会有大的发展。我们到农村看到的几个点，确有个新的起色。

大50%至1倍左右，人口密度也稍大，但是玉林损失量与四川作比较，四川盆地受淹农作物、倒塌房屋、损失人民币，分别是玉林的2.93、9.57和6.1倍，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两个地区同样降暴雨，为什么受灾情况大不一样？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森林植被不同，四川盆地只有3—5%（据1981年中国林业第六期介绍），而玉林地区是25%，两个地区相差甚为悬殊。玉林地区损失较小，森林植被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历史上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特点，玉林地区在一次降雨强度200毫米的情况下，受灾损失微乎其微。由此我们设想，如果把全国的森林植被由现在的12.7%提高到20%以上，并且分布比较均匀，这样抗灾能力将大大提高。相信到那时候，象1978年延安只降雨150多毫米便冲毁半个城的悲剧，便不会重演了。

玉林地区林业设计院 吕骥武

从四川洪水灾害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春雨过后彩虹多

闽清是个山区县，省瓏公社是闽清的深山区。近两年，这里的竹编制品畅销海外，是闽清的一宗特产。县里的同志安排我们去省瓏竹编厂参观。

汽车刚进省瓏地界，司机就指着小溪上的石拱桥说：“桥多，是这里的一个特点！”可不是么！站在公社办公楼前，三条沟里的四座银灰色石拱桥，在灿烂阳光下，被青山绿水映衬得特别显眼：桥上有关突冒烟的拖拉机，有打着花伞、戴着斗笠的行人。

这个公社到底有多少座桥？公社的同志告诉我们：包括公路桥在内，共有50多座，总长度1公里多，其中有近两年新建的石拱桥37座。

为什么近两年新修了这么多拱桥？原来，这里山高沟深，溪涧纵横，一个大队往往由几个自然村组成。社员下田种地，也要过溪涧。多少年来，一场大雨雨不了村，涉水过溪被冲走的事，时有发生。至于挑运东西、儿童上学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里的群众从祖辈开始，就盼望着交通方便。全国解放以后到1976年，闽清山区的交通明显

改善。随着公路的延伸，省瓏公社有10多座由国家兴建的公路桥。但是在隔开各大队和各自然村的溪涧上修桥的愿望，仍然没能实现。

近两三年来，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省瓏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地制宜种植，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因缺粮吃变成了卖余粮。没有桥，卖粮只好靠双扁挑；多种经营发展了，山林得到垦复，设有桥，毛竹、木材、柑桔、茶叶和竹编制品不能及时运出山；社队开始变富，集体有了更多家当，没有桥，拖拉机、农具等农业机具进不了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农民群众修桥铺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洋里大队81户人家，利用1979年冬天和1980年春闲的农闲时间，自己劈山、运石，挖基、翻挑，一举建成3座拱桥，把3个自然村联成一体。炉前大队的干部，带领全村社员，先在1979年冬天，建起了长达34米的石拱桥，接着又在1980年冬天，在村内建起长20米的石拱桥，大大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公社负责同志自豪地说：“解放后到前二三年，修桥铺路靠国家投资；现在呢，社队有钱，农民富了，都是自己干，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本报记者 江世杰

本报通讯员 许加宏



南方渔民同内蒙古农民合作养鱼

安徽省副食品公司今年从上海购进两箱共两万多斤，运到牧区后，很快就被吃光了。牧区牧民们非常高兴，常常要了方便路，经常到哪儿，用开水一泡就吃，吃下后浑身热呼呼的，比起吃青稞炒面来，又方便，又改善生活。北京等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牧民们希望上海等地能多供应一些方便食品。

雷振社



靠科学技术挖掘生产潜力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电解镍车间的调查

文 禾

新增5,000吨电解镍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挖潜革新得到的。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挖掘老企业的潜力,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不能嘴里喊老企业有潜力,而实际上还按老框框想问题、办事情,更不能坐在办公室靠延续了三十年的老办法来编造生产方案。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电解镍车间,设计能力年产1万吨,1964年投产,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解镍车间。去年,他们一不中断生产,二不减产电量,三不伸手要改造资金,只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改变电解镍生产主要技术条件的试验,稍加些措施就可以使现有设备生产能力提高50%,一年可为国家增产5,000吨电解镍。

电流密度、电解液的PH值(酸碱度),是生产电解镍的两个重要技术条件。PH值高低直接影响着电解镍质量好坏;同样条件下,电流密度大小决定电解镍产量多少。因此,国内外许多搞电解镍生产的企业,都把提高电流密度作为增加产量的重要手段。

1979年,金川电解镍车间的孙昌儒等几名五十、六十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在老电解工出身的车间主任徐宝泰大胆支持下,不改变电解液PH值,作提高电流密度增加产量试验,没有获得成功。1980年1月,他们开始作PH值高低对电解镍质量影响的试验,前后经历了120多天,测定了大量试验数据,找到了一种新办法,在电流密度不变的条件下,使电解镍质量明显提高,一号镍品级率由79.49%上升到85.25%(一号与二号

电解镍每吨价差1,400元)以后,在已经提高PH值的电解液中,再次作提高电流密度(增大电流量)增加产量的探索,两个月中反复试验比较,终于取得了成功,电流密度由原来162安培提高到223安培,电解镍产量提高42%,质量很好。整个科学实验过程,以极少经济费用,换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

这两项主要技术条件改变后,为开辟其它增产途径创造了条件。后来,他们又采取两项增加阴极面积的措施,使电解镍产量增长8%以上。这样一来,不增加电解槽子,每年可增产电解镍5,655吨,11种定额材料消耗全部下降(特别是酸、碱、氯气消耗下降幅度较大,纯碱、硫酸、盐酸、氯气的电耗分别下降14%、15.7%、15.9%、13.7%),电耗增加0.7%,生产一吨镍总成本下降7%。

近三年来,在电解镍车间,类似提高电流密度、提高PH值,以及有连带的重大挖潜改造项目还有5项,已经完成了改造或应用,效果也都很好。如试验成功的试验电极隔膜架及扩大阴极面积,全部应用后每年可节约优质木材1,000m³,提高电解镍产量1,470吨。当然,把这些已经找到的增产措施全部用于生产,还要花一些钱解决外困

些辅助条件,比如为提高电流密度要增加送母线容量;随着产量增加,要扩大堆场;要添几个加热器等等。但是,这要比新建一个年产5,000吨电解镍综合生产能力的工厂,节省时间,节省投资。

最近,参加金川科研的全国各地专家、教授、工程师,全面审查了电解镍车间这项科研成果,并作出了技术鉴定。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办法是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发挥更大经济效益的正路。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电解镍车间5,000吨电解镍生产能力的挖掘,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老企业不是没有潜力,而是潜力很大。通过技术改造,既发挥了生产能力,又提高了技术水平,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嘴上也喊,老企业潜力很大,可是,想问题,办事情,还是按老框框,总是想走多要投资,多建新厂这条路,看不到也不愿起老企业挖潜改造,觉得挖来挖去油水不大,不如销新摊带旧,痛快。对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依靠现有企业进行必要的改造,出生产力,发展速度,推进企业走向现代化,大不相同,不感兴趣。也有的同志由前几年盲目乐观,热衷于搞本来没有条件实现的大计划、高指标,变成能搞多少算多少,情绪消沉,坐待秋后。

5,000吨电解镍生产能力的出现,可以使人耳目一新,敢于否定那些坐在办公室里,靠着延续了三十年的老办法编造出的方案。这些同志对电解镍车间同志敢于和善于把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实践中的事例吸取力量,振奋精神,脚踏实地,认真解决老企业改造中的问题,使我国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浙江省奖励优秀科技成果时,围绕防虫磷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应不应该授奖的问题,引起了一场值得注意的争论。防虫磷是用原有农药马拉硫磷,经过提纯、脱臭,制成的一种储藏害虫防护剂。这种药剂对防治粮库中的害虫有良好效果。经过鉴定,农业部 and 粮食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各地粮库和种子保藏中,推广应用这项科学技术成果。

对于这样一项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研究成果,浙江省科委和有关领导部门认为,应该授予优秀科学技术成果奖。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同意。他们认为,马拉硫磷是一种现成的农药,这项研究只不过是提纯和防治储藏害虫的效果及施用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属于常规技术,不能授奖。

经过争论,更多的同志认为,防虫磷虽然不是一种新研制的药剂,但是,它同研制一种新药剂比较起来,花费的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它虽然不是发明创造,但应算一项研究成果,奖励是应该的。因此,最后同意给予奖励。

类似的争论,也存在于浙江省今年奖励的绝大部分属于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分不清科学技术发明一般科技成果的区别,往往用科学发明的标准来衡量一般科技成果;二是由于一些同志重开拓性的基础研究,轻视应用性的技术研究。比如,高

在评奖科技成果中值得注意的争论

效低毒农药氧化乐果生产工艺的研究解决了国内十年来未曾解决的难题,使这种短缺农药的生产总收率从35%提高到45%以上,为我国大规模发展氧化乐果的生产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但是,有些同志以不是发明首创为理由,不赞成给予奖励。经过争论,这项成果得了二等奖。

浙江省科委的同志认为,这些争论看来似乎解决了,但产生这些争论的原因却不能忽视,它涉及我们评定科技成果的标准,科技成果的奖励政策,以及如何引导广大科技人员贯彻科学技术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等重大原则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着眼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在评定和奖励科技成果时,偏重于某项成果的科学水平,而对其推广应用价值和带来的经济效益则比较忽视。在我们这样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工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生产中都有大量应用技术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果我们不是主要根据发展国民经济需要来评定和奖励科技成果,就会把广大科技人员的注意力引导到单纯追求脱离生产实际,不问推广应用和经济效益的错误方向上去。

事实上,在一些科技人员中,已经出现了盲目追求科技水平,忽视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不讲究经济效益的苗头。因此,我们在制定科技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对科技成果的奖励政策时,都必须贯彻科学技术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这一根本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技术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

本报记者 周祖佑

面向农村 着眼农业

——蒲圻县泉口农业中学的办学经验

湖北省蒲圻县泉口农业中学,是1979年秋由一所普通高中改办的。在校学生105人,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各设一个农技师和一个机电班,学制三年。这所学校现有学农基地159亩,微生物实验室一个,茶叶加工机械一套。学校周围有6个小山包,可以发展油茶生产。根据公社规划,农中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将安排到社办企业,一部分将担任大队、生产队的农技员或机械管理员,也有部分回家务农,少数可以继续深造。通过两年来的教学和生产实践,学生既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又学到了一些农业技术上的基本知识。

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办学初期,这个学校领导制订的教学方案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时间的安排等,都和全日制中学一样,名义上叫农中,实际上是普通中学,学生、教师、社队干部都有意见。去年9月,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重新制订了办学方案,明确提出农业中学必须面向农村,着眼农业,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办学方向。学生在在校期间,除学好普通高中文化基础知识外,还要学好一门农业专业设置,并具有一定的实际操作技能和本领。在课程设置上,文化课基本按普通高中教材进行,但要从严从实,不抢进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专业课开设农办技、机电两个专业,不要同农业专科学校一样搞理论,主要是为他们将来从事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或继续深造作一些知识准备。这样做,比较符合农校和学生的实际。

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泉口农中在办学实践中,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教学与劳动的关系。教学与劳动时间的比例为三比一。这样,既坚持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又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也澄清了农业中学就是“劳动中学”的模糊认识。在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农中开办一个半月内,不让自己的女儿到校。后来,他亲眼看到农中并不是单纯地劳动,又把孩子送回了农中。

二、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学生在校三年时间,用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学习文化课,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专业课。在时间和内容安排上,既不破坏文化课的系统性,又根据专业课的需要有所侧重或增补。如农技班在讲授化学课时,增补了“土壤分析”、“分析化学”、“化学农药”、“淀粉”、“糖类”等方面的内容。对化学课学生同上专业课关系不大、农村一时用不上的“主族元素”、“钢铁工业”、“合成氨工业”等内容,则采取略讲的方法。同时,他们还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自编了一些教材。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处理好教学、生产和科研的关系。学校设立了教学科研组,由教导主任、专业课教师组成,领导全校教学研究和各项科学实验;学生会配备了一名科研部长,班委会设有一名科研委员。同时,建立了各项实验记载制度和验收制度。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认真负责、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又锻炼了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两年来,农技班的学生开展了水稻、小麦、油菜、棉花三十多个品种的选育对比试验和不同种植方法的对比试验,取得了积极成果。有个女学生按照学校讲授的方法,回到家中种了一分棉花试验地,产皮棉20斤。机电班的学生学完了电的知识后,到生产队进行了室内室外线路安装实习,深受社员群众欢迎,称他们是“不要工资的电工”。

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当地农民和农村干部对农业中学作用的认识提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的观念,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今年以来,全校学生中除两名因特殊原因转学者外,无一流动。泉口公社干部和学校师生员工说,农业中学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事业。

本报记者 杨建武

西安交大党政领导做出表率

压缩办公用房解决教学急需

西安交通大学党政领导对校舍紧张,为国防分忧,从我做起。今年“七·一”前后,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等10位负责同志,将原来的10间办公室压缩为6间。在他们的带动下,校系党政部门普遍压缩、调整了办公用房,腾出近30间占用的教室,缓和了今年秋季新生入学生后教学用房紧张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前,西安交大教学用房与学生人数是比较适应的。十年动乱期间,招生人数减少,校办公用房增加,行政用房扩大,加上近年来成立新系、新教研室,搞电化教学,不少教室和实验室被占用。今年上半年,该校77—80届共有学生6,300名,但无业班,81届新生入学生后,在校生人数突破8,000名,教学用房缺额更大。

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党委下决心,先由校领导自己做出样子,压缩办公用房,并要求党委各部门带头。学校10位领导同意原来每人一间办公室,现除两名年老和有病的,其余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18—20平方米)。75岁的党委书记苏昆同志,腾出原办公室的一间会客室,自己在只有9.47平方米的小套间办公。校领导作出表率,校系党政部门纷纷腾出了19间办公室。随后,各系也压缩、调整了办公用房。暑假前,全校已腾出教室近30个,为即将毕业的77届学生,安排了有条件的实验室,为今年新招收的81届学生安排了固定教室。师生们反映:校领导带头压缩办公用房,为教学服务,为学生着想,这件事办得及时,办得好。本报记者 景险峰



辽中、新民两县中小学教师植树造林

既绿化了校园又增加了收入

沈阳市辽中、新民两县农村中小学坚持校园绿化造林,利用自产木材,修缮扩建了校舍,解决了其它单位一批木材和树苗,收入达3万多元。不少学校用这笔收入解决了部分办公费用和学生困难补助费用。

植树造林,不仅给这两个县的中小学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绿化了校园,改变了校风校貌。目前,两个县的中小学基本上消灭了“光秃房”、“秃操场”,很多学校校园绿树成荫,百花飘香。学生中也形成了“植树、爱树、管好树”的优良风气。张 岩

到目前发展,辽中、新民两县的中小学共植树378万多棵,已经成材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近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空军各院校大批毕业生主动申请到边防部队工作

最近,人民解放军空军各院校有一大批毕业生,主动申请到边防部队、到空军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这些主动申请到边疆工作的学员大都是高中毕业后从地方考入空军高等军事院校的,他们中的有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有的来自大城市,还有不少人

是干部子女。空军雷达技术大专班毕业生、共产党员董亚平,家住南京。学校曾考虑让他毕业后留校当教员,他自愿

“天鹅蛋”生产性人工育苗试验成功

山东省牟平县象岛海珍品养殖试验场,最近在烟台地区水产研究所和牟平县水产局的指导帮助下,育出“天鹅蛋”仔贝1,303.6万个。使“天鹅蛋”生产性的人工育苗在国内首次获得成功。

“天鹅蛋”学名紫石房蛤,属深水性贝类,喜欢栖栖在水深4—10米深的泥沙砾质的海底,主要产在我国辽宁、山东沿海。“天鹅蛋”个体大,体重可超过一斤,味道鲜美,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都很高。因其外形椭圆,如之稀罕少见,沿海人们就给它取名为“天鹅蛋”。由于近年海区污染和海浪

的变化,资源日渐减少,这就更显得它名贵。“天鹅蛋”生产性人工育苗试验成功,为进一步增殖“天鹅蛋”的资源,并在人工育苗和养殖上闯出了一条新路。目前,象岛养殖试验场正加紧管理已育成的仔贝,准备投放到选定的海区区内,继续进行人工增殖资源、扩大放养面积的试验研究。孙德汉

河津县新华书店组织流动发行队伍

把科技书籍送到农民手中

山西省河津县新华书店组织流动发行队伍,将1.5万册农民急需的农业科学技术书籍送到农村。去年以来,河津县普遍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的三种责任制,新华书店科技书籍的销售量越来越大。书店干部、职工在搞好门市部和基层图书发行的同时,组成流动发行队,坚持常年累月到农村走乡串户,热情送书。每次送书都携带农村图书目录,主动向社员介绍适合当地作物的农技书籍,办理预约预订手续。米海荣



个患者出现的症状很不一致,因而处方也必然不同。

所以患者千万不要打听别人的有效处方,抄来自己服用,必须到医院就诊。

在人体生命活动的全过程,更年期是进入老年期的前一站,推迟更年期的到来和顺利度过更年期,实际上也是防治老年病、延年益寿的措施。我们的祖先在养生学上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其中大部分仍适用于今天。

古语中常谓调经的“持调、御神”(保持神经、调节精神、“精神内守”、“老阳守中”、“形气不伤”(经常活动身体,但也不要过于)、“法于阴阳”(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避免致病邪气的侵袭)等等,如若在日常生中,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对于推迟更年期、防止衰老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中医是很重视精神调节的,这一点在更年期综合症的调治中尤为重要。健康的精神生活是调治更年期症状的最好“药物”。为了分散对疾病的注意力,尽量地不脱离工作和学习的兴趣,遇到自己激动时,应努力克制自己,寻找其他事物解解不快快的想法,应有意识地避免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刺激。与患者经常接触的人对患者应该体谅、忍让,不要回避,尤其是亲属更应在生活上多体贴,帮助她顺利地度过更年期。

北京西苑医院 钱伯璇 魏子孝

谨防病从口入

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主要是细菌,次为病毒及虫。细菌、病毒及虫混入饮水和食物里,经口—食道—胃—小肠—大肠。由于病菌等怕热喜冷、怕酸喜碱,而大肠是碱性的,温度也适合病菌繁殖生活,因而容易引发病变,发生肠道传染病。大便里还会排出大量肠道病菌和病毒等,污染环境,造成传播。

正常人的胃酸里含有盐酸等酸性物质,能杀灭很多种细菌。正常肠道菌群能分泌对抗各种肠道病菌的有特殊抵抗力的液体,其中主要是免疫球蛋白A,有这种抵抗力,病菌就不能粘在肠粘膜上进行繁殖,自然也就不会生病了。因此,胃肠正常的人,吃进去少量病菌是不会闹病的。但是年幼、体弱、有病、老衰、平素有胃病的人,胃酸及肠粘抵抗力都不足,就是摄入病菌不多,也会发生肠道传染病的。

在夏秋之季,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力消耗较多,抵抗力下降;加之饮水多,容易冲淡胃液浓度,降低了杀菌力;或是有人天热贪凉,或是生食不规律,体弱不足;或是过食生冷、饮酒赴宴,大吃大喝等,使胃肠功能失调,抵抗力低,这种人大吃进少量病菌,都可能发生肠道传染病。这也就是夏秋肠道传染病发病率较高的原因。

夏秋季节肠道传染病,由病菌引起的有细菌性痢疾、伤寒、细菌性食物中毒、急性肠炎等。病菌引起的有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病毒性肠炎等。病菌引起的有阿米巴痢疾等。

预防肠道传染病并不难,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群众的卫生科学知识,做好饮食卫生工作。农村要搞好“三管”(管粪便、管水源、管饮食卫生和消灭苍蝇),要培养青少年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等。

吴宗瑞

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黎 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从此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辛亥革命距今七十年。以今视昔，江山不可复识。然而如何全面地认识这次大革命，仍旧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兴趣。

一、清末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这个事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在武昌发动起义以及在各省响应起义的领导和参加者，很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里当然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那么，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处于什么状况？他们在革命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样起作用的？

本来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经面临着必须使本身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但是清政府狂妄自大，他们打了败仗以后，仍旧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国，无意进行任何改革。清政府长期拒绝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是中国民族资本出现很迟并且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先，人们的思想变化和政治要求在后。近代中国情况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规律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这些人本身又是曲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美、法的殖民冒险家，用枪炮帮助清军打平了太平天国。这时，清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认识到西方现代武器的优越性，开始兴办军用工业，同时开办少量民用工业，后人称他们为洋务派。洋务派没有对民族资本采取鼓励的政策。相反，他们采取了限制政策。

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新建海军全部被毁，洋务在舆论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对洋务的批评尤其尖锐。

维新派明确要保护和奖励发展工商业，自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适当的。过去他们赞许革命派，不适当地贬低了维新派。因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彻底推翻清朝统治，斥之为乞求点滴改良，这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如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根本点上，结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应当承认，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勇敢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子，对这场搏斗感到异常危险和犹疑。例如，资本家张謇就是维新运动的反对者。造成资产阶级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间的这种显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们的代言人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代言人看来，只是挽救民族危机的途径。可见，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直接动机。这种矛盾现象，在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本身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是同样触目的。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一度取得较为显著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加。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他们害怕革命，反对改革，总是期望在最少动乱和最少痛苦的情况下谋求改革。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大国俄国，中国的工商界和知识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此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有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研究会等等。其他各地规模较小的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据统计全国不下80余个。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立宪派在1910年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尤其给了清朝统治以直接的打击。资产阶级立宪运动，本有抵制革命的性质。但是由于它要求限制和削弱清朝的专制权力，所以不能被视作异己的力量而加以镇压。镇压的结果是使资产阶级愈来愈绝望于清政府，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多对当地资产阶级采取了联合和合作的态度。有的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在咨议局中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络，甚至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对资产阶级及其上层代表人物来说，一则革命已经临到眼前，怕也用了，避也来不及了；二则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担心的那种破坏；三则旧朝覆灭，大势所趋，本无所容，也就并不感觉受患深重。

资本家拥护共和，但并不因此成为革命党。他们捐输饷项，支援革命军也是从本阶级的实际利害着眼的。请看张謇一段日记，辛亥年八月二十九日：“欲江宁之回复秩序，设议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出发，须财政经费数十万。”这是指江宁一地，欲图全国恢复秩序，环绕江宁，那就要靠最有实力的袁世凯了。张謇等一大批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心拥袁，力促南北议和以成功，就是出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打算。

既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很不成熟，而在政治上又长期不支持革命，其上层分子还反对革命，那末这次革命究竟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

二、辛亥革命的胜利

研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可以得到一个极深的印象，那就是，反满是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又是他们用来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反满思想是清朝入关以后在汉族及其他遭受满清统治者反复镇压的各族人民中深深扎根的，是随时可以发芽的仇恨的种子。它在恰当的时机被利用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深刻的感染力。从

仔细考察反满思想在革命党人中的表现，那是很不相同时的。最早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些革命党人，大多数起初都怀着反满复汉的心理。以后由于接触西学，开拓了眼界，民主主义觉悟逐渐提高。在他们头脑中，反满便同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后来投身革命的大多数人，也多少经历过类似的思想发展过程。但情况始终是复杂的。有些人是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后投身反满革命，有些人接受民主思想之后，选择了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有些革命党人始终没有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汇集在同盟会旗帜下的革命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会党。会党本来就是反满的秘密组织，因为年代久远，政治色彩逐渐淡薄。但他们的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会党中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基本上没有文化，民主共和是什么东西，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多半是由于反满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压迫的愿望。当他们的活动没有革命党人的领导时，反满便是唯一的政治口号。

海外华侨曾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为逃避满清统治者的压迫而冒险出洋去寻求新的生活出路。他们在海外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歧视，更增加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恨，其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当然，华侨中多少受过西方教育的，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孙中山创建民国的理想是不难接受的。

革命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怀着激愤的反满情绪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但细考他们的思想，却很不相同。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邹容、陈天华、章太炎都是最著名的革命宣传鼓动家。然而他们的思想和影响各有特点。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称之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正是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小册子中，最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陈天华发表过《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论文，对民主政体还缺乏详细研究。他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着重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人们奋起挽救祖国的危亡。邹、陈的宣传最为激昂慷慨，起了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章太炎的轰动一时并引起过诉讼的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于1903年。其中“截断小丑”一句公然骂皇帝，不可谓不激烈。然而除了反满之外，并没有提出鲜明的革命目标。如果说，邹容、陈天华等是鼓励人们为救国而反满，为共和而反满的话，那末章太炎基本上是为反汉而反满。考察章氏的政论，始终不见他有明确的民主共和的观念。他的真实思想还是推戴一个有名无实的汉族专制皇帝。前面提到的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类似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代青年，都是戊戌维新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动摇，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章太炎是已经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其思想、学问根基已深，接触一些新学说，或补充加研究，终不足以改变其旧学根基。章太炎一派反满论，时时露出孔孟以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套春秋大义的痕迹。这是经历数千年的牢关偏见。他们的出现，在古代自有历史的理由，在近代却显然是荒谬的。这种现象，从另一角度说明，反满革命的口号具有极端落后的思想文化渊源，因而是一个最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之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一传统的口号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这样做的结果，不免影响革命的深度；在革命党领导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由于孙中山和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共和国的观念毕竟已为多数人所欢迎。不管他们实际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如何，共和的口号已同反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最鼓动力量的口号。

庚子以后，清政府暴露出已彻底腐朽，社会危机急遽成熟起来。但是即使如此，统治者仍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的发反抗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立宪派不敢尝试以暴力夺取政权，官吏阶层更谈不上主动倡义，唯有革命党人，高张革命大旗，誓决颠覆清廷，创建民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

10月10日，惊天动地的革命起义在武昌爆发了。不过一个月，响应者十余省。在每一省的宣言或类似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有驱逐鞑虏的口号，从前一切对清室、贵族及其政府不满或失望的们，都或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集到全国性的反满革命的潮流中来。被彻底孤立的一小撮满清统治者，甚至已够不上作为革命的对手了。革命胜利看来已成定局。但是乘时而起的是袁世凯，却是个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挟清室以率制革命党，利用革命党以威逼清室。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攫取反满革命的胜利果实，可是革命党人很少减少。南北议和的局面所以能够出现，除了因南京清政府惊慌无主，无力北伐的物质原因外，长期隐然存在的反满复汉心理，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成功了。至于在武昌起义后才陆续转而赞助革命、拥护共和的立宪派和某些汉族官僚们，就更不肯让革命再往前进一步了。于是1912年2月12日清室宣布退位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

清朝垮台了，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学绩。这是无数革命党人流血牺牲的结果，也是同孙中山的领导分不开的。反动派的篡窃，掩盖不了先驱者们的业绩。

三、孙中山与清末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奥华城（今译丹佛）第二天早上读报才获知“武昌为革命占阙”。所以他说：“武昌之功，乃出于意外。”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判断孙中山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不能。武昌起义恰好在1911年10月10日因新军工程营一个小

小的事故引发开来，谁也不可能预先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偶然“成于意外”是不不错的。但是作为一次反满革命的总爆发，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是清末革命运动经历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清末革命运动同孙中山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积极从事反满活动的第一人。他自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临终遗下遗嘱还是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仍是从乙酉中法战败之年起算的。清朝对外战争的失败使一个爱国青年感到耻辱，因而产生反满情绪，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决心把它推翻。他在此后学习和行医期间都会念念不忘聚集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准备。中国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的反满思想占了上风。他很快集合少数支持者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反满秘密团体兴中会，并且准备利用对日战争失败在群众和战后被遣散的士兵中引起的严重不满，在广州发动起义。

广州起义没有来得及发动就因有人告密和香港军火不能及时运到而中止了。这次失败的起义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功，就是产生了极广的宣传效果。一时风声鹤唳，清政府惶惶失措，悬赏千金通缉“匪党孙文”。孙文从此成了可怕的名字。在亡命伦敦时，又因中国驻英使馆加以拘禁，引起一场风波，西方报纸称他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领袖。清政府对他的切齿痛恨和流亡者的厄运使孙文的名字成了革命的旗帜，这是所有同时并起的革命党人所不能代替的。

孙中山由于最初的革命活动而造成的赫赫声名，不能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失去了直接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扎下根基的机会。可是长期在国外从事活动使他成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富有直接了解的人。他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开始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尽管当时他的民族主义还限于排满，但排满毕竟是一个最能号召群众、推进革命运动的口号。1905年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是用这个口号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者联合在一起了。三民主义使同盟会在政治上比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具有更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的性质。孙中山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排除了在反满革命胜利以后恢复汉族君主制的思想，力主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坚决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承认，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

为了团结反满力量，孙中山多次向被清朝视为叛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接近合作。因康有为以帝师自居，坚持保皇，甚至拒绝同所有平民身份的孙中山见面而未获成功。两派在华侨社会中争夺群众，矛盾尖锐。他由此认识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不容混淆。1903年秋冬，他在檀香山首先发难，批驳袁祖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机关报《民报》又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使两派论战达到高潮。这次论战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紧紧围绕清末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革命或立宪展开的。在论战中，虽然双方都暴露出严重的片面性和幼稚性，但革命党在这次论战中却赢得了更成功，那就是扩大了革命排满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使《新民丛报》感到穷于应付。如果孙中山不发动这场论战，那末革命旗帜就会变得模糊，革命意志就会涣散，以致失去团结和鼓舞革命力量中的中心。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势必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

孙中山叙述清末革命从兴中会1895年广州起义到同盟会1911年广州起义，先后10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都是同他的领导和组织分不开的。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都步清朝统治以打击，使各地革命党人感受到新的鼓舞。孙中山具有伟大革命家所特有的可贵品质。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气概。湖北革命党人不愧是孙中山的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不是感到沮丧，而是继续举行起义。

四、革命党人何以不能保持政权？

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这个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资产阶级特别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不同程度的依附于原来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中央专制的大帝国，政权层次很多，封建统治特别严密，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性的政治力量。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小团体的政治团，不能把已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由于思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多数拥护孙中山，并在同盟会中居领导地位，为它规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目标。所以同盟会首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团体，它所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不能把同盟会与国内资产阶级看作一回事。国内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资产阶级立宪团体，1906年才出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预备立宪会党和宪政公会似乎稍稍打破了狭隘的地方性。其他如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等，都是与当地士绅联合而成的纯粹地方性团体。

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统一独立性的政治行动，直到1910年的国会请愿高潮才出现。但是他们中间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成立友党会，

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统一和独立的趋势又向前进了一步。但这是在清朝专制统治迅速走向瓦解，新的统治力量尚未形成的时刻出现的情况。一旦清朝统治崩溃，民国建立，袁世凯做了总统，友党会的力量很快就涣散、分裂，大部分被袁世凯的势力吸引过去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连影子都不见了。革命党人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即涣散、分裂、重新组合。一个本身力量很微弱的阶级，又怎么能比较巩固地形成统一的独立性的政治力量，要想掌握政权，自然是不可想象的。

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我们看到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即经过革命一度建立起来的政权，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充当它的坚强支柱。前面已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资产阶级比较一致的支持，民国建立后不久，就失掉了这种支持。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怎么样呢？地主买办阶级不支持它，这是显而易见的。农民群众支持它吗？也不。革命党人的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认真发动农民，农民没有革命中得到好处。海外华侨曾经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大的支持。但武昌起义后，人们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幻景，华侨再也不敢提供过可观的支持力量。孙中山曾希望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当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他放弃回国的强烈愿望，而“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在列强间折冲樽俎。可是结果两手空空。帝国主义者早已选定了袁世凯做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以很大的财政支持。

这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政权便失去了任何支持力量，以致根本无法对付拥有很大反革命实力的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压力。

武昌起义前和起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曾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思想积极从事实业建设，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功成身退的思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准备功成身退，升官发财，做民国的新贵。这种状况引出两种结果：一是革命党本身涣散、分裂、瓦解，不能成为吸引群众、巩固政权的中心力量。另一个是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以为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治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本来这一切都根源于革命力量本身的脆弱。但他们在当时并不正视这一点。他们常常表示的某些良好的主观愿望，例如建立法国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等等，把他们自己欺骗了。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黄兴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公之才高出经世万端”，希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其实，袁世凯哪里是什么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在日前前也致电袁政府表示说：“闻宰相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也赞成与袁世凯妥协。不过孙中山在政治上考虑比黄兴多，他的一个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朝统治者绝对不会，一旦获得外国援助，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问题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他的策略思想不能为多数党人所理解；又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很难同袁世凯较量获胜。

当然，他们不能说革命党人对他们牺牲生命得来的革命果实毫不珍惜，随意抛弃。他们曾努力设法使袁世凯就范，迫使其忠于共和制度。主要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把他首定在南京，把袁世凯调离旧势力的巢穴，到受过革命洗礼的南方执政；第二是制定《约法》，要袁世凯遵守。革命党人希望这两条办法能使袁世凯完全就范。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第一条完全不曾实行，第二条也成了——纸空文，毫无效力，反而施展阴谋，步步进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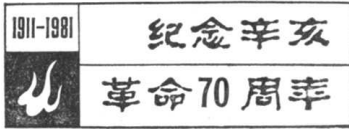
可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仍旧缺乏了解。1912年8月，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与袁见面，接谈多次，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袁氏“绝无可疑之疑点”。事后，又给海外同志写信说：“南北意见之凝滞，至此乃涣然冰释”。袁世凯到底搞什么鬼，这个革命党领袖仿佛在五里雾中。

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遭失败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如果立法者本身没有足以保证执行的权力，人民及其代表无从加以监督，那么，当权者就不会尊重它，它就形同废纸，毫无实际意义。宋教仁多少看出了一些问题，企图发展政党的力量来加强国会的作用，并力图用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以防君主专制的变相复辟。从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制度的需要而言，袁氏不足为见。然而，他不识袁世凯为何人，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致成为民国成立后以身殉国的第一人。

总之，不论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经验看，他们丧失政权是必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失去政权之后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进进行的斗争一样，在主观上并非为争取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权，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他们不愧是为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断然决定与真正可靠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只有忠诚的爱国者才能采取的十分勇敢的行动。孙中山又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合俄、蒙、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他在从事革命斗争以来经过多少失败并总结了经验以后作出的决策，是对中国革命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史发展中，孙中山和袁世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卓越贡献和光辉业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时间过得愈是久远，其意义将愈为后人所深知。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转载时作了删节）



近两年来，不少老同志通过写革命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或者采用同青年通信等方式，向青年一代讲革命传统，讲共产主义人生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文章和书信立意真切，生动活泼，许多大道理寓在讲述文学、历史知识和革命故事之中，深受青年们的欢迎。不少人不约而同地，爱不释手，认为是难得的革命教材。

这些文章和书信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呢？

我以为是原因有三：一是针对性强，有的放矢，不是空洞对空；二是老同志对读者抱着平等的态度，亲切交谈；不是以教育者自居，板起面孔训人；三是不少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寓理于文，有血有肉，娓娓动听，不是枯燥无味，干瘪说教。

由此想到力求把理论文章和思想修养读物写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在当前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十多年来，革了文化的命，许多青年在精神饥饿中成长，缺乏必要的科学文

化知识，增加了攻读马列著作的困难。尤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现代迷信，破坏了理论的声誉，使一些青年至今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这就更加迫切要求我们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可是，现在理论文章和政治读物要讲究文采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文章写得不动、不活泼，大大影响了宣传的效果。既然自然科学方面可以出版趣味物理学、趣味植物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为什么不可以多出一些针对性强，引人入胜的政治理论读物呢？

希望革命老前辈们在百忙之中，有的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抽出一点时间来同青年们谈家谈常，用你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深切感受，写出好的文章来；希望理论、文学、史学等各条战线的专家们，在创作长篇巨著的同时，也挤出一点时间，写一些通俗的政治理论书籍，为启迪青年们的心灵，浇灌祖国的幼苗做出贡献。我热切盼望八十年代能有更多的新《大众哲学》出现！

欢迎“谈家常”

卢子贵

住的情况下，抽出一点时间来同青年们谈家谈常，用你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深切感受，写出好的文章来；希望理论、文学、史学等各条战线的专家们，在创作长篇巨著的同时，也挤出一点时间，写一些通俗的政治理论书籍，为启迪青年们的心灵，浇灌祖国的幼苗做出贡献。我热切盼望八十年代能有更多的新《大众哲学》出现！

群言录

哈密瓜与苦豆子

新疆的哈密瓜很甜，当地人称它为甜瓜，可大家并不一定知道甜瓜的主要肥料之一是——一种叫作苦豆子的植物。苦豆子不仅很苦，据说还有毒，它决定着甜瓜的含糖量。这使人感到惊讶。

细想起来，这是最辩证的生活辩证法。生活中的甜与苦、美与丑、善与恶等等对立的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人们却往往忘记这一点，把事情看得很死。

譬如，现在社会上某些人一提起来某些青年，每每摇头叹息，似乎这些人只是天生活泼的淘气鬼。不错，由于动乱，他们缺乏教育，有的消极颓废，也有的是比较自私，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这仅仅是青年中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个侧面。不少“文革”初期受到毒感感染的青年在“四人帮”统治的严酷现实面前，开始思考，逐渐觉醒，并且反抗了。他们成了“四五”运动的主力。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的时候，许多青年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努力。尽管不少人还不太成熟，有些观点还值得讨论，但他们的探索、思考、敢于创新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是好的。随着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的贯彻执行和健全完善，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定会成批涌现出来，就跟苦豆子能培养出甜瓜一样。

《花海》，是诗人严阵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所写的抒情诗的结果，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人在这部诗集中尽情抒发了自己对春天降临祖国大地的欣喜心情。他借花抒情言志，用蕴涵哲理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一再被生活叩问了的真理：“没有花香哪里有鸟语？没有春天哪里会有花香？这大好的春光啊，是人民自己为自己作出的安排。”（《第三首》）“如果花儿嫌树不美，那花儿自身的芬芳，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第三十一首》）这些优美的诗句警策隽永，耐人寻味。

诗人并没有沉溺于这“醉人的时光”，他在纵情高歌时向我们指出：生活是严峻的，生活中还会有“暴风雨”，还会出现“霜冻”，“寒流”，“乌云”，“冰雹”。他用动人的诗句激励我们不要迷恋大好春光，“能焕发芬芳的尽量焕发芬芳吧”，“能酿造甜蜜的尽量酿造甜蜜吧”（《第四十首》）他还指出：“为了四季如春的乐园，吸吮2000年的甘露，我们还必须不辞辛苦地去跋涉面前穷困的沙湾”（《第四十四首》），为此，诗人歌唱“一心一意地想把春光酿成蜜汁的‘蜜蜂’，赞美‘并不光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 北京画院中国画廊展

讴歌花的时代

——读严阵的诗集《花海》

何光汉

唱动听的歌”的“杜鹃”。

读着《花海》中诗意盎然、韵律和谐的诗章，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这些歌颂革命圣地的诗歌，那些吟咏太湖、西湖、黄山等地以及台湾胜景的诗歌，使我们宛如随着诗人的导游，重睹了战争岁月的烽火，饱览了祖国山川的秀美。严阵在这些风景诗中往往借景抒情，托物咏志，阐发生活的哲理，表达人们盼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科学美景胜西湖

黄既

西湖之美，千古传颂，游罢西湖归来的旅客，对于那些终年生活在西湖风帘幕中之的人们，又怎能不流连忘返呢！

我第一次旅行到西湖。那时看过一些什么奇景，由于事隔已四十多年，现在只剩下模糊的记忆。然而那次走访身居西湖之畔的洪式阔教授，却给我留下了永不模糊的印象。西湖的佳话很多，洪式阔教授的治学精神，却是与千百篇西湖佳话迥然不同的另一篇佳话。

寄生虫学家洪式阔教授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他是我的一位老师。抗日战争前，他在我们的医学院里任教。当时他在杭州的一个研究所里从事研究工作，每当我们医学院有几个假期时，他们到北平住几个月。他讲课时，学生们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这不仅因为他操着一口江浙话，听起来有些费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讲得有条有理，引人入胜。

他不用讲稿，只是如数家珍似的讲下去，有时黑板上画一个简单的图，以示某种寄生虫体或虫卵的特点。他那偏高的身材，圆圆的面孔，头顶有些谢发，手拿粉笔放在胸前，站在讲台上很少走动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那次我们到杭州，一共有七八个人。在游西湖之前，我们先到研究所去拜访了我们的这位老师。他正在一间堆满了书籍资料的房间里写作。在一架屏风的后面有一张床，大概夜里他就睡在那儿。他带我们参观了研究所里陈列的各种寄生虫和病媒昆虫标本，对于这些标本的来源，他都一一作了解释。

当我们向他告别时，他拿出一沓折扇，给了我们每人一把，笑着说：“这是杭州的特产，凡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都送他一把做纪念，这是我的老规矩。”他接着又说：“不过很对不起，你们游西湖，我不能做向导，因为我在杭州住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游过西湖。”

我们带着惊奇而又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研究所。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游完西湖，这位身在杭州而从来没有游过西湖的教授，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最后的诀别

田中木

1936年的大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黄军、黄红两人来访。这时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黄军的做手艺。且不说做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一“神功”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样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口，并且赞不绝声，与黄军、黄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里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乐。

最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心，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关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抽进被窝熏了熏又熏了熏的烟圈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大声叫喊。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排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住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圈

里有啥来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香烟是你买的吧。”听到这句话什么奖赏都费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

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

人暂离愁绪。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信息